

土家族研究丛书

苏晓云 张洪伦 郭大孝 彭振坤(常务) 主编



■ 胡济民 胡 源 著

土家族 革命斗争史略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土家族 革命斗争史略

■ 胡济民 胡 源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六月

策 划：杨光宗

责任编辑：黄修义

封面设计：赵国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家族革命斗争史略/胡济民 胡 源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6

ISBN 7-81056-655-5

(土家族研究丛书)

I.土… II.①胡… ②胡… III.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土家族 IV.K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0447号

土家族革命斗争史略(胡济民 胡 源)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路27号 邮编：100081

国际互联网地址：<http://cunlp.com.cn>

电子邮件(E-mail)：nckpm@public.bta.net.cn

电话：(010)68472815 / 68932751 传真：(010)68932447

印刷者：武汉市楚风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9.19 字数：220千字

版 次：2002年6月第一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1056-655-5/K·69

印 数：0001-2000册

定 价：20.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张正明

中国的少数民族，迄今已确认的有五十五个，大半在边疆。其中，人口达百万以上，而都不在边疆的，只有一个民族。然而，正是这个深居祖国腹地的民族，为了保卫祖国的海疆，不辞往返万里，甘作殊死之战，成为抗倭的劲旅，屡破顽敌，叠建奇勋。

沿流讨源，早在殷末周初，这个民族的祖先就曾协助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在牧野之战中，他们士气高昂，兵锋凌厉，向敌军进攻时载歌载舞，使敌军前列的徒兵因气馁心惊而倒戈反走，为周人击灭殷朝的决战立下了头功。

后来，在汉王刘邦的部队里，这个民族的祖先屡膺前驱重任，摧锋陷阵，加快了汉朝统一中国的步伐。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说，刘邦观看了他们的歌舞，赞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

仅仅凭着上面陈述的几项业绩，就应当把这个民族的名称用擘窠大字写在中华各民族的“凌烟阁”上。

这个民族今称土家，其近源是有多种因地而异的名号的“蛮”、“夷”，其远源是巴人。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有五百七十余万人，分布在武陵山脉及其邻近地带，大半在鄂西南和湘西北，小半在川东南（今属重庆市）和黔东北。

假如认为土家族历来重武轻文，除了能征善战之外别无所长，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据宋玉《对楚王问》所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下里》大概是楚歌，《巴人》无疑是巴歌。源于峻岭幽谷的巴歌，居然传进位于平原广泽的楚都，成为流行歌曲，由此不难想见其工妙为何如。唐代兴起的《竹枝词》，实为巴人俗文化与汉人雅文化交融的结晶。岂但风靡一时，而且流传久远。直到近代，武陵山上的文人和上海滩上的文人都还喜欢写《竹枝词》。这样的文学体裁返祖现象实属罕见，其中的奥妙就在《竹枝词》出于雅俗之间。

公允地说来，土家族的文治和武功都灿然可观。

然而，历史可能造成令人迷惘的误会，时到近代，土家族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不为外界所知了。官方也罢，学界也罢，都把土家这个民族淡忘了。这个民族与自己祖先的联系，几乎化为杳渺难寻的天外逸响了。

但是，历史也会带来令人庆幸的机缘，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唤醒了土家人的民族自我意识。

最早认定土家人的语言属于藏缅语族的，是罗常培先生。最早指出土家人乃巴人遗裔的，是潘光旦先生。罗先生在近代中国的语言学界，潘先生在近代中国的人类学界，都是实至名归的宗师。

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时，潘先生是系主任。他那渊博而融通的学识和缜密而机敏的思维，使我不胜钦服之至。1953年冬，我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供职时，听潘先生讲过从巴人到土家的源流关系，有茅塞顿开之感。

1954年春，中央派出中南民族工作视察组，我有幸忝列其间。到了湘西，这个视察组分成两个小组：第一小组调查研究苗族的

农业生产问题，第二小组调查研究土家的民族成份问题。我算是特别走运的，先在第一小组中，后到第二小组去。为行期所限，第二小组只到了永顺县的老司城。我们所调查的，主要是语言和风俗。当初我在大学里跨校选课，到燕京大学去进修过语音学。虽说懂得国际音标总比不懂国际音标强些，无奈只做过课堂作业，没做过田野作业，毕竟术业不精。在老司城，我初次用国际音标为一种全然陌生的语言记音，其艰难之状虽以“三脚猫”喻之亦不为过。请几个人反反复复地说，我一个人仔仔细细地听，折腾了几天，自我估计准确程度能有八九不离十就算是好的了。至于像宾语在及物动词前面这样属于藏缅语族的特点，则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我所做的，无非跟王静如先生学步而已。那时，在老司城一带，土家人十之八九还会讲土家话。同时，他们十之八九也会讲汉语，这在我们做民族工作的人看来是不足为怪的。

某日，做完调查之后，一位土家老农带我去观赏一处号为“美女梳头”的山景。到了那里，发现果然别有一般情致在眼前。从“美女梳头”下来，走近老司城时，见到一位老年土家妇女的衣装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当即为她拍了照。1997年，湖北民族学院《土家学刊》创刊号登载了这幅旧照。听说，要找到更早的土家女装照片，已难如登山采珠了。岁月迁流，人生浮沉，萍踪飘泊，能把这幅照片珍藏至今，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1956年，国务院做了实事求是的决定，确认土家自成一个民族。

从地理环境来看，由于山重水复，而且与通都大邑相距甚远，土家族及其文化有毋庸置疑的闭塞性；从历史传统来看，由于总是与祖国同荣辱共休戚，土家族及其文化却有不可低估的开放性。这种闭塞性与这种开放性交织交缠，使土家文化呈现出奇妙的景观。分属于不同流域的土家人，其方言和土风都很有个性；同属

于一个流域的土家人和汉人，其方言和土风都不乏共性。尽管如此，土家族还是土家族。试以语言为例，尽管酉水流域的土家人与武水流域的土家人不能用土家话交谈，只能用汉语交谈，可是酉水流域的土家话和武水流域的土家话是土家语的两种方言。再以信仰为例，尽管清江流域的土家人崇拜白虎，酉水流域和武水流域的土家人驱赶白虎，而在汉人的“四灵”中也有白虎，但崇拜白虎和驱赶白虎都是白虎信仰，清江流域的土家人以白虎为祖神或家神，酉水流域和武水流域的土家人也有祖先吃虎奶长大的传说。诸如此类的实例，假如要求巨细无遗，那就还能举出好些来。

概而言之，在一个民族中，有地域的多元性，促成文化的多样化；在诸多民族间，有国家的一统性，促成文化的一致化。无论从“民族中”的文化多样性和“民族间”的文化一致性来看，土家族及其文化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因此，研究土家族及其文化既有特殊意义，也有普通意义。

长江以南的诸多民族大抵错居杂处，相安相亲。土家族与苗族、汉族长期错居杂处，我、你、他交互影响、交互渗透，出现了许多双族之家、双语之家，甚至还有一些相当罕见的三族之家、三语之家，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

从1991年到1995年，在三个不同的学术会议上，我都讲过中国有一条很长、很宽的文化沉积带，说详小文《读书·考古·采风》（编入《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大意如下：

中国的地形，从西到东，从高到低，大致可分为三级阶梯。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带，位于第二阶梯中段的东缘和第三阶梯中段的西缘。这里是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

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却尚有遗踪可寻。这么长又这么宽的一条文化沉积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当然,时移则势异,保存在这条文化沉积带里的古代文化事象或多或少已经变了形,甚至变了性,但总能使人察见文化事象流变的线索,此今彼古,“情与貌,略相似”。

土家族正好分布在这条文化沉积带的中部,所保存的古代文化信息特别丰富,因而颇受文化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的青睐。武陵山区的傩祭和傩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傩祭和傩戏都更加多姿多彩。武陵山区端公(师公)的法事,可与大巴山区端公的法事媲美。清江流域的跳丧和酉水流域的摆手,都能使人联想到三千多年以前的牧野之战。有些地方的土家人在跳丧时,不论识字与否,都还会唱屈原所作《九歌》的《国殇》,也是其他任何地方都听不到的上古流韵。土家族的“吊脚楼”式样繁多,营造精致,特富“干栏”遗意。古老的史籍《春秋左氏传》讲到老虎给弃婴喂奶,现在有些地方的土家人还能讲老虎给弃婴喂奶的故事,也令人称奇。诸如此类,当然也只是略举数例而已。

以前,对北方民族研究得多些,对南方民族研究得少些;对边疆民族研究得多些,对内地民族研究得少些。这是正常的倾向,不是什么偏向。近十余年间,有志有识之士重视对南方民族、内地民族的研究,是势所必至而理所当然的。土家族又是南方民族,又是内地民族,人口又多,地域又广,而且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对文化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的魅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湖北民族学院有见于此,适时地设立了土家学研究中心。约两年半以前,我到湖北民族学院去参加“还坛神”研讨会,发现这个研究中心有一支小而精的学术梯队,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并重,不仅自己研究,而且能吸引院外、州外、省外的学者也来研

6 · 总序

究。从他们自称只是“初步”的研究成果中，我看到了丰赡的素材和纷披的精义，深为感奋。后来，听说湖北民族学院正在筹划编纂《土家族研究丛书》，觉得这是水到渠成了。现在，《土家族研究丛书》的出版已指日可待。这套丛书的问世将是土家学构成云蒸霞蔚的体系的标志，乃欣然为之序。

一九九九年四月六日

目 次

总 序	张 正 明
序 言	1
第一章 湘鄂边苏区是我党在民族地区建立的	
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7
一、湘鄂边地区的革命高潮与低潮	7
二、湘鄂边地区的年关暴动与特色	9
三、从桑植暴动到鹤峰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16
四、贯彻“六大”精神和民族地区	
第一块根据地的形成	19
第二章 湘鄂边的红四军是最早以军为建制	
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红军	24
一、一片丹心忠于党的贺龙军长	24
二、红四军建军史上的转折	26
三、新型人民军队的成长和壮大	32
第三章 根据地的党和政权建设	38
一、党组织的建立和成长	39
二、苏维埃政权和群团组织建设的建设	48
第四章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62
一、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	62
二、土地革命纲领的制定	63
三、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动、作法和成果	64

四、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湘鄂西特委	
对“左”的土地革命政策的抵制	71
第五章 地方工农武装茁壮成长	74
一、地方武装的建立和发展	74
二、地方武装部队的建设	79
三、地方武装是保卫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支柱	82
第六章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87
一、根据地的农业	87
二、根据地的工业	91
三、根据地的商业贸易	95
四、根据地的财政和税收	98
第七章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101
一、土地革命前的土家苗族地区的	
文教、卫生状况	101
二、根据地的教育	102
三、根据地的文化	112
四、根据地的医药卫生	117
第八章 湘鄂边苏区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21
一、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	121
二、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	129
第九章 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苏区在全国	
红军战略大转移中的地位 and 作用	133
一、黔东特区是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目的地	134
二、湘鄂川黔苏区是钳制、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阵地	145

三、二、六军团遵照新的战略战术方针， 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154
第十章 贺龙在土家、苗族地区的统战思想及其实践 ...	157
一、贺龙统战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 和发展的实践基础	157
二、贺龙统战工作的核心思想和策略原则	159
三、贺龙统一战线政策在湘鄂川黔边区的胜利	164
附录：	
一、土家族在卫国保疆中的贡献	173
二、恩施土家、苗族聚居区的清代留学生 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182
三、叶挺将军囚禁恩施的岁月	191
历史文献	202
后记	238
总编后记	239

序 言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苗人、维吾尔人、壮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一产生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草案中，初步规定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途径和政策，把国内各民族的解放斗争作为党纲的一部分。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民主。”为了宣传贯彻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党还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杂居区开展建党工作。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从而，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

湘鄂川黔四省交汇的广大地区，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汉语意为“本地人”。全族总人口570多万（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主要分布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五峰、长阳两个自治县，重庆市石柱、秀山、酉阳、黔江和贵州省的沿河、印江等自治县。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东南部 and 西南部及松桃、印江等县，湖南省的花垣、凤凰、吉首、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市；湖北省的宣恩县和重庆市的彭水、秀山、黔江、酉阳等县。它是历代先后迁入的兄弟民族，土家族是土著民族。

土家族历史悠久,是古代巴人之后。巴人最早生活在今陕西、甘肃一带。母系社会末期,巴人迁居到今湖北长阳一带。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和郑氏,他们一同生活在湖北长阳县的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巴氏之子务相以投剑于石穴,乃独中之,乘土船,独能浮,为巴族五姓共推为全族首领,尊号“廩君”。率其部落向西开拓。渐由湖北清江流域,扩展到川东的广大地区。曾以“巴方”之名称见于史册。巴与中央王朝接触较早,夏禹会诸侯于会稽时,巴蜀与焉。武王伐纣时,廩君后世孙巴大柵带领一支部队,助周伐纣,在战场上,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因此,周的建立,巴人是有功绩的。故武王克商后,以其宗姓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即历史上有名的巴子国,都城在江州(今重庆市)。春秋战国时,巴国连败邓、庸等国,进入了“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的强盛时期,一度与楚抗衡。到战国后期,秦的力量逐渐强大,巴、蜀两国经常战争,国势日衰,楚趁机并巴,占据了巴国大片土地,加之巴内部发生内乱,其活动范围急剧减小。公元前316年,秦灭亡了巴国,置“巴郡”,秦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并以秦女下嫁巴人首领。巴人作为一个总体开始解体,一部分进入今陕西、甘肃一带;一部分南下进入湘西、黔东南;一部分进入湖北天门、沔阳一带,这部分巴人后被汉化了。还有一部分没有迁移。他们的子孙同域内其他民族,长期交往,相互融合,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到宋代,“土蛮”、“土人”、“土民”的称呼开始出现,以区别当地的苗人、汉人。土家作为一个民族,此时已经形成。明清时期,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土家”是汉人对其称呼。他们聚居于湘鄂川黔交汇处。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披荆斩棘,开发了这片土地,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苗族也是我国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古老民族之一。约在三千多年前,苗族的先民就活动在长江中游“荆楚”地带;后来,逐步从洞庭湖溯辰江、沅江西上,到

达湘西、黔东地区,后又向黔南、黔西北及鄂西、川东地区迁移。苗族人民长期生活在我国长江中游和西南广大山区,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到了清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的重大政治制度变革后,过去“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封闭禁令被打破,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大批的不断的迁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土家族苗族同汉族及白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形成这一地区民族分布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仅就湘西、鄂西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人口统计:湘西自治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56.2%,其中桑植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6.3%;鄂西自治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45.1%,其中鹤峰县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51.15%,在少数民族中土家族人口居首位。

土家、苗、白、汉各族人民,在与险恶的自然环境和残暴的统治阶级作长期的斗争中,不仅形成了吃苦耐劳、淳朴倔强的性格,而且铸造出英勇不屈、敢于抗争的精神。为了反抗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剥削压迫,他们不畏强暴,不惧艰险,揭竿而起,向邪恶势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比如在清仁宗喜庆初年,川、鄂、陕、甘、豫五省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而土家、苗族地区的白莲教是其中规模较大,起义时间较早的一支,曾震撼当时封建统治者;从清同治初年起,土家、苗族地区在酉阳、黔江、长阳、恩施、利川等地此起彼伏的爆发了反对外国传教士、保护民族权益的斗争,显示了强烈的爱国热忱。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冒着敌人的残酷迫害和镇压,批判和纠正了党的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战略,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开创了新的局面。继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革命红军第一师,建立井冈山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

党在湘鄂川黔地区先后也建立了湘鄂边、湘鄂西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历时达八年之久。土家、苗、白、汉等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8年1月9日党中央在给湖北省委书记郭亮的信中说:“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暴动割据的局面,并派贺云卿(即贺龙)、周逸群等同志返湘工作。”1月下旬,贺、周抵达湖北监利县反嘴,会合了贺龙的老部下,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奉命返回洪湖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贺锦斋等人,领导了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后,于2月28日贺、周及贺锦斋等人一起回到了贺龙家乡白族聚居区洪家关。在土家、苗、白、汉等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很快出现了一支由贺龙、周逸群率领的工农革命武装,于1929年6月在土家、苗族人民聚居区创建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它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第一块红色区域。形成了鹤峰、桑植、石门、五峰、长阳为中心,包括湖南的大庸、慈利、永顺、龙山和湖北的恩施、巴东、建始、宣恩、来凤、咸丰、利川、松滋等县在内的广大地区。它也是党中央在全国各地组织武装暴动,实行分区割据的整体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赋予了古老的山区以全新的意义。后又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当时几块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根据地之一。1932年夏,蒋介石对湘鄂西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搞冒险主义,在革命根据地内部搞“肃反”扩大化,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这次围攻,丧失了洪湖苏区。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被迫远征千余里,转移到湘鄂西根据地的大后方湘鄂边苏区。1933年夏,蒋介石任命湖北军阀徐源泉为“湘鄂边剿匪总司令”,纠集湘、鄂两省十四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采取分路向根据地合围。由于红三军分散活动,因此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于1933年12月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县的大村召开会议,不得不决定放

弃湘鄂西根据地中仅剩的最后一块湘鄂边苏区,向川东转移,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

红三军经过半年的艰苦转战,直到1934年6月下旬,才在黔东南建立了一块根据地。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奉中央之命与红二军团(红三军)会师于黔东特区根据地。1934年下半年和1935年,全国红军都在长征、转移,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之下,在土家族、苗族更广阔的聚居区内,创建了近百万人口的湘鄂川黔新苏区,开辟了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包括湖南的保靖、慈利;湖北的宣恩、咸丰、利川;重庆市的黔江、彭水、酉阳、石柱、秀山;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等县在内的广大地区。其游击区更为广阔。成为我国南方最后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建树了卓著功勋。这支部队成为我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建国以来,对这两块在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内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研究中,有关战史方面的资料、研究成果甚多;而对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成就和它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战略地位、作用及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等方面的资料、研究成果甚少。为了弥补这一空白,并纠正有关认为这里是丛山峻岭,群众落后,不能巩固和发展苏区;或是在敌人进攻之下,认为苏区有立即消灭的危险等观点,我们萌生了写作此书的最初的想法。

在本书中,我们不以内容的全面和结构的完整为目标,在写法上力求摆脱面面俱到的模式。主要是在突出“特色”两字上下功夫。既要突出民族特色;也要突出它与其他根据地的不同特点,为我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宝库增添一些新内容;同时也还要突出这块根据地的特殊战略地位和其他根据地难以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此书的重要特点,本书还将《土家族在卫国保疆中的贡献》、《鄂西清代留学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叶挺将军囚